

第一章

辽金时代的一个村落

一、辽代南京燕下乡海王村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 1770 年），工部营缮司郎中孟澐在当时琉璃厂这里的工地上监督工人施工时，接到工人禀报说他们在挖洞取土，挖到地下数丈时，发现了埋在地下的一块巨石。孟澐凭他的经验，觉得这恐怕是挖到了一处古墓，于是就让工人们把那石块取出来。工人刚把石块用绳子吊起，忽然一阵狂风刮来，从洞中涌上来一阵卷风，旋转了十几个圈子，霎时间形成飞沙走石。等狂风过去，孟澐命人把巨石翻过来看，原来那是一块石碑，上面的刻字是：“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公元 978 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

东燕下乡海王村……。”事情弄清楚了。这是辽国御史李内贞的坟墓。说明这个地方在辽南京时是在京城东郊，名叫海王村。

由于李内贞墓的发现，大致上可以推测出辽南京东城墙的方向，这说明在辽时已有了燕下乡海王村的地名。李墓发现后 10 余天，他们又重新将其改葬。改葬的地方离原来的墓地不远，但改葬的墓至今尚未发现。

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职的钱大昕听说出土了李内贞墓志碑文后，曾想将它拓下来，但当他赶到那里时，碑已经又被埋掉了。不过幸好孟澐事先曾让人将墓志抄录了下来，于是，钱大昕将它借来读后，写了一篇《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文章。一年以后，孟澐又请大兴学使朱筠为改葬李墓一事写了一篇《改葬故辽李公墓记》。这两份资料都提到李内贞墓的墓志，但彼此间有不同之处，经过校录，得出全文如下：

“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讳内贞，字吉美，妣汭人。后唐庄宗时举秀才，除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雁门县主簿，次授蔚州兴唐县主簿，次授儒林郎，试大理寺丞，字妣州怀来县丞。大圣皇帝兵至，迎降，太祖一见器之，加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兼属珊都提举使。嗣圣皇帝改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检校尚书左仆射。故燕京留京南石门行都统燕王牒蜡以公才识俱深，委寄权要，补充随使左都押衙中行使，兼知厅勾，次摄蓟州刺史，次授都举银冶都监。天赞皇帝改检校司空、

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行太子左卫率府率。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先 嫖殷氏女，有三子；后 嫖何氏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顺皇帝授普济大师，赐紫。长子瓚，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纪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次子琰，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前大石银冶监督。次子珣，前辽兴军节度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次子璟，摄宣州观察推官。”

从墓志看，李内贞任过不小的官职，而其所葬之处叫海王村，金代可能会改名为海王庄（见震钧：《天咫偶闻》）。若从辽太祖神册元年（公元 916 年）算起，距今（1995 年）已有 1079 年了。

1979 年，考古学家赵其昌曾考证出辽金时代的燕下乡在唐代叫燕夏乡，其区域在当时的东城墙往东至今广渠门一带，东北至今东单御河桥，北部西端至今西四羊肉胡同一带，大约是东西长 7 公里，南北约 3 公里的东西狭长地带。海王村是燕夏（下）乡的一个村，其区域应在琉璃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看来这个村是很大的。至于海王村或海王庄之名称，赵其昌先生认为可能与水道有关。据考证，东单御河桥附近，为古高粱河流经之地，海王村邻近高粱河，也许因此而得了这样一个地名。

二、辽、金时代海王村是一个繁华场所

既然知道辽、金时代琉璃厂这一带叫海王村或海王

庄，那么人们就会饶有兴趣地去研究那时这一带的情况是怎样的。

海王村离辽南京的东城墙不远，属于都城近郊，至于李内贞的墓甚至还处在关厢一带。辽南京城的东部即今宣武门至广安门一带、迤南至右安门一带。辽、金时这一带属显忠坊等几个坊。李内贞墓在明朝时期，是处在宣北坊与正西坊中间。这一带在辽、金时代是很热闹的。据《日下旧闻考》第五十九卷记载：“宣北坊在新城广宁门里，宣武门迤东响闸迤西，至都城西南角便门西北角，七牌四十五铺，有玉虚观、接待寺、竹林寺、老君堂、报国寺、紫金寺、昊天寺、善果寺、归义寺、宏法寺。”

这些寺庙都是辽、金时代的古刹。

玉虚观是金朝建筑，在今广内街道办事处境内思源胡同。金时属仙露坊。这里有与岳飞对阵的金兀术的祠堂，曾有金泰和八年（公元 1208 年）尚书户部主事云骑尉庞铸所撰的碑。

接待寺在今达智桥路北，辽代古刹。

竹林寺在今长椿街北口路东，国华商场后面。金时属显忠坊。辽道宗清宁八年（公元 1062 年），楚国大长公主舍私第建寺，叫竹林寺，金代熙宗时是驸马宫。

老君堂是都土地庙，在今下斜街，辽代古刹。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辽代古刹，在今广内大街。相传院内有辽乾统三年（公元 1103 年）尊胜陀罗尼石幢，还有金代所植的两棵古松。明代宪宗时因为周太后之弟在此出家，又重修庙宇。清代又曾几次重修。

紫金寺在善果寺东南百余步，在今范家胡同西面，建

于辽代。金时属开远坊。

昊天寺在西便门大街之西，辽刹。辽道宗时，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阳坊第作为大昊天寺。

善果寺在今宣武艺园一带，建于南北朝后梁年间，当时是一个大庙。

归义寺建于唐，安史之乱时，史氏归顺，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建此寺。辽时也有石幢。金时属时和坊。

宏法寺，《日下旧闻考》载无考。

除了《日下旧闻考》中记载了这 10 个寺庙外，离琉璃厂不远还有辽、金以前的古刹，即白马寺、圣恩寺、延寿寺、悯忠寺。

白马寺建于隋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正月上旬，在今宣武门外 4 里许。

圣恩寺又名大悲阁，其地约在今牛街北口，建于唐代，辽代重修。辽圣宗因避雨曾入大悲阁，大悲阁遂改名圣恩寺。金中都时，牛街北口这一带也叫做“蓊门”，与古蓊城称作“蓊门”重名。这个地方很热闹。据《金史》记载：大定二十三年（公元 1183 年）世宗对臣下说：“朕前诣兴庆宫，有司请由蓊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辽圣宗避雨大悲阁这一雅事，构成了“蓊门飞雨”这一风景美名的来源。后来，因大悲阁圯废了，“蓊门”这一地名也不复存在，但“蓊门飞雨”这一风景美名又演变成为“蓊门烟树”的提法。清乾隆皇帝好古，他到处寻访古迹，随意指元大都的西墙残址为“蓊门”，并在那里立了一通“蓊门烟树”的石碑，任人凭吊。这样，真正产

生“蓟门飞雨”这一美名的地点，就与现在立碑的地址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延寿寺始建于辽，《日下旧闻考》曾把它的始建年代追溯到东魏、隋、唐。延寿寺的面积很大，《琉璃厂小志》中说它“东起五斗斋，西迄方壶斋”，即包括后来琉璃厂的整个地域范围。延寿寺是辽、金两代的重要庙宇。据《燕云录》载，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父子被俘，押解到金中都后，赵佶夫妇就被囚在延寿寺，金人从汴梁所掠夺的车辇等物也存放在延寿寺。这在从延寿寺发掘出来的断碑中都有记载。赵佶夫妇被囚后所受待遇尚厚，可以看毬射游戏。但赵佶心情极坏。延寿寺的残址还有一口古井，据说他经常在这里“坐井观天”。现在延寿寺经过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变迁，寺基愈来愈小，这口井也早已被填湮没。希望今后随着本市危房改造工作的进行，这口井能够重见天日，供人观赏。

悯忠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法源寺。宋钦宗赵桓曾被押解到这里，一路上受尽欺凌。据《燕云录》记载：“七月初十日，靖康帝、祁王太子至自云中，馆愍忠祠。司马朴云：帝自四月朔，青城起程。粘没喝（按指金朝将官）令易青衣、顶毡笠，乘黑马，监以骑兵。帝时时仰天泣，辄被呵止。从官先令骑马，马毙即令步行，迟以鞭撻。行止坐卧番儿监之。夜宿时，粘没喝毳帐可容百人，紩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

赵桓所受的待遇比起赵佶来要差得多。徽钦二帝被俘北上的遭遇，史书记载甚少，后来又被送到上都（一说是

黑龙江依兰，一说是吉林扶余），记载更少。

上述十几个寺院密布在辽、金时代的东城墙里外，说明当时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人们来这里朝香礼拜，因而交通也是便利的。有的寺院还自己印刷发行佛经，反映了当时文化发达的状况。延寿寺和悯忠寺两个规模宏大的寺庙更反映了当时这一带的繁华，其中延寿寺的寺址还在辽南京城东郊，说明那时郊外也是热闹非凡的。可是，后来历经几个朝代的沧桑变化，临到北京解放时，这一带，也就是今天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辖区一带，竟都是贫民集中、摊贩林立之所，人们只看到城市贫民在玉虚观一带出卖自己穿剩下的破衣烂鞋，哪里会想到当初在辽、金时代这里曾有过寺庙密集、金碧辉煌的景象呢？

元朝在灭亡金朝的过程中，曾大火烧掉了金中都这座繁华的城市，但也有幸免于难的地方，起码邻近金中都东城墙的延寿寺就没有被烧掉。当年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总会遗留给琉璃厂一些深远的影响。例如，已经到清朝初期，著名诗人毛奇龄仍在怀念宣武门竹林寺旁有座名叫顶泉居的酒家，它那里卖一种酒叫蓊酒，其所以叫“蓊酒”，这跟唐代这一带叫蓊县有关。他曾写诗称：“竹林寺畔顶泉居，井冽香甘新醅余。”既然一座名刹和它旁边的小酒店仍能在几百年后使人引起这样深刻的怀念，那末，这个地方当年那样典型的诵经、印经等文化活动，又怎能不给后世留下更深的影响呢？

第二章

元代的皇家官窑

金中都毁于兵燹后，元朝在它的东北面另建都城，这就是元大都。

原来的金中都被称做旧城，旧城中仍居住着一些人口，也有集市。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带。海王村是顺承门和丽正门之间的一个村落，处在大都城与旧城之间，仍然是元大都的近郊，地位很重要。元朝如果要兴建宫殿，把这里作为原材料基地之一是很方便的，这便是海王村在元代出现烧制琉璃瓦窑的由来。元朝在修建大都城和皇宫时需要大量的琉璃瓦，这一特点已被当时到中国来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注意到，他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描写元朝大明宫的情况时说：“顶上之瓦，皆红黄绿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其烧窑的地方就设在今天的琉璃厂一带。据张涵锐写的《琉璃厂沿革考》记载：“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

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这个分厂就是今天门头沟三家店附近的琉璃渠，今尚有遗址。

此外，当时琉璃厂这地方也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元大都建立后，达官贵人们出城踏青，多往旧城的白云观、法源寺、天宁寺游览。这些地方在金中都被大火焚毁时因处于城外而没被波及。人来这里过路多了就走出了今日的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王广福斜街、上斜街、下斜街等几条斜形街道。其间也要路过琉璃厂。那时的琉璃厂无疑是个风光明媚、吸引游人驻足的好地方。有了窑厂，有了工人，又有水泊，可以想象这里自然不难成为可以登高眺远、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第三章 明末清初 琉璃厂成为京都的文化中心

一、明代的琉璃厂

元大都城只存在了 80 年，就被朱元璋的军队攻破了。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明将徐达率军攻下大都后，将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 5 里，成为明代北京城的北城墙。永乐年间，北京城又一次重新修建，在原大都城三宫（大明、兴圣、隆福）的基础上，营建紫金城、西苑（即北海和中南海）、南内（南池子一带）、景山等宫苑。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和皇宫，其工程之浩大，征调民工、军工数量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北京城有五处最大的工地：台基厂（堆放柴薪）、神木厂（堆放由运河运来的巨型木材）、大木厂（堆放和加工木材）、琉璃厂（烧制彩色琉璃砖瓦）、黑窑厂（专烧黑色琉璃瓦件）。这五处工地中，琉璃厂是个重

要的厂地。因为皇宫营建工程在整个明代是不断地进行着的，所以琉璃瓦直到明末也还在不断地生产着。万历时出版的《西宫鼎建记》一书中记载：“琉璃、黑窑工程重大，非军不可售事……，查得旧例：锦衣卫拨军一千名……。”锦衣卫是皇宫禁军，一般用于监督民工劳动，既然连锦衣卫的军士都动用了上千名，那么征用民工的数量也就可想而知了。该书又记：“两窑用柴 9700 余万斤，约银 14 万 6 千余两，题准砍伐南海子树木合用抵无……。”从使用人力或物力的规模来看，都可以说明当时琉璃厂工地之大。

琉璃厂一带原来就有河道，又加上烧窑取土，窑厂附近常常形成许多坑洼，叫做“窑坑”，这一来，交通往来就非有桥梁不可了。所以，琉璃厂附近的许多地名多带有“桥”字。清朝李慈铭的《桃花圣解庵日记》中写道：“盖自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径脉流通。”

几句话勾画出了这里沟渠纵横的情况，这无疑是个好景观。琉璃厂既为窑址，当然会有管理衙署的机构。到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建筑了外罗城，琉璃厂从此变成了城里，这里也就有了街道。明嘉靖时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记下了当时琉璃厂已有了东门和西门。东门附近则有炭胡同、斜街、筒子胡同、新火神庙、安南营、章（臧）家桥等地名（属正西坊）；西门附近则有柳巷儿、椿树胡同、章家桥西等地名（属宣北坊）。这里既有景观，又有街道，所以明代有些官宦在退休以后，就携带着大量图书和文玩到这里来定居，这也成

为这里日后成为文化街的一个因素。隐退的官宦和赶考的举子在这里翻阅图书或观赏古董，从而逐步培育了这里的文化气氛。

但明代的琉璃厂，毕竟还主要是一个为皇家烧制琉璃瓦件的地方。它占地很多，人烟比较稀少，树木很多，还有河流、水泊、高阜、下洼，基本还是郊野的景色。它虽然已有一些街道，但还没有形成市。在明代人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和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等书中，都没有说当时琉璃厂是一个市，它只是一个窑厂，可以供游人玩赏。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琉璃厂除大量从事琉璃瓦件的生产外，同时还生产其它一些琉璃器物。明末诗人吴伟业在咏及琉璃厂时，曾描述过用琉璃烧制的器物及其安装情况：

“琉璃旧厂虎坊西，
月齐修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凤吻，
绛绳扶上广寒梯。”

在《倚琴阁杂钞》一书中记载：“琉璃厂瓦有黄碧二种，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殿瓦之外，所置一曰鱼瓶，贮红鱼、杂翠藻于中；一曰琉璃片，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练成，嵌入窗户；一曰葫芦，大或者径尺，其色紫者居多；一曰响葫芦，小儿口衔，嘘吸成声，俗名倒掖气；一曰铁马，悬之檐以受风戛者也。”

从这些琉璃器物中可以看出，当时金鱼池（金代叫鱼藻池）蓄养金鱼风气之盛。《帝京景物略》也对此作了详

细的描写，同时也记下了一些当时的儿童玩具。这些琉璃制的儿童玩具如“倒掖气”（又名“扑扑登”）等，一直到笔者的童年时代，人们仍能见到。

二、明代的京都文化中心在正阳门两侧

明朝科举制度很发达，各地举人要进京赶考。明嘉靖年间，为安排来京赶考举人住宿的会馆也应运而生，大都分布在前门外正阳门两侧。举人们来到北京，有时要买些书，有时为了生活需要而卖掉一些书籍，此外还要购买一些文房四宝，这样就促成了书市的诞生。书市最早是分布在大明门之两侧，即考场旁边，相当于今日天安门旁边。明万历年间，胡应麟所著《少室山房集》中记载：“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这一段文字除说明了书市后来挪到了灯市和城隍庙外，还说明了其基本地点是在今天的天安门两侧；同时也说明了当地除书市外，还卖其它东西，可能包括古玩商市在内。这也为以后琉璃厂古书业和古玩业的同时存在作了一些说明。在《帝京景物略》一书的“城隍庙市”一条中，也送到了明代京都的古书业是先在大明门，后挪到城隍庙市，尤其详尽地说明了古玩业在都城隍市的情况：“京师市各时日：朝前市者，大明门之左右，日日市，古

居贾是也。……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匣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綾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市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庙建自永乐初，正統中重修洪武初，神有封号，曰：监察司民城隍庙显佑公。今称都城隍之神。……庙有石刻‘北平府’三字，字径尺，半埋土中。”

这里所说的“大明门之左右”的“居贾”，是指搭盖着简易棚房，常年每日进行营业的座商。他们常年活动的地盘还是在天安门两侧，后来则挪到了城隍庙的庙会上。按我国传统迷信说法，城隍老爷是城市的守护神，朱元璋建国后特别重视城隍老爷，遍封了各地城隍神，把城隍庙捧到很高位置上，并且把城隍庙会列为各种庙会之首。所以书市挪出大明门后就到了城隍庙市，而且从上述《帝京景物略》中关于介绍“城隍庙市”的这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当时其隆重的盛况。

随着书市最早分布在今天安门两侧，印书的书铺也就相应地开设在正阳门两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代几家书铺的地址中看出：

金台汪谅书籍铺	正阳门西今西交民巷处
叶铺	宣武门内铁匠胡同，今西单附近
赵铺	北京国子监前
金台岳家书铺	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
刑部街陈氏书铺	今人民大会堂一带

西河沿洪家劓劓斋

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书铺

正阳门里东城下张家书铺

从这张不是完整的书铺名单上可以看出，它们开设在正阳门的两侧，这是明朝出版业的中心，也是明朝京都的文化中心。有的书铺还很会做广告。如金台汪谅书籍铺曾于嘉靖元年（公元 1522 年）印发过书单，上印：“金台书籍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最后落款是“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版校正新刊。”说明当时临近年关了，书铺要广泛推销书籍，争取更好的收入。这种状况可以说明明代的文化出版业是很发达的。正阳门两侧有书铺，西河沿也有几家缙绅铺，当时在琉璃厂只有一家老二酉堂书店，所以在明代，琉璃厂还不是京都文化中心。至于为什么琉璃厂会出现老二酉堂书店，只能作这样理解：那些居住在琉璃厂周围的举子们在考试期间或等待考试期间，闲来无事，到这里游逛，产生了交换书籍或买卖文房四宝的需求，于是就产生了老二酉堂书店。这家书店一直保留到北京解放以后，曾搬到东打磨厂经营，直到公私合营并点时才消失。

三、慈仁寺

明末清初，当时京都图书文物业的中心已经挪到大明门西边的都城隍庙，后来不幸发生火灾，于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书市和文物市又挪到了都城隍庙南边，现在广

安门大街路北的慈仁寺。

慈仁寺为辽刹报国寺故址。明成化年间，太后弟周吉祥自愿出家为僧，明宪宗朱见深同意他的要求，就将报国寺改建了一番来安置他，并以为母后祝寿为名，赐额慈仁寺。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叫这个庙为报国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叫法。

慈仁寺内有几种景观：

1. 双松。如双龙偃游，浓荫覆地，蔚为奇观。孙国敕在其《燕都游览志》中说：“大慈仁寺，殿前二松，相传元时所植，台右一株尤奇。”也有人说其中一棵是金时所植，王士禛诗云：“复见金元双树在。”双松于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枯死，但直到清末，人们每谈及慈仁寺时，仍都谈到双松。

2. 毗卢阁。登阁可以望见卢沟桥，不少游人蹑脚登临以远眺风景。

3. 窑变观音像。传说明成化年年间自内府颁来，为镇寺之宝物。原置于毗卢阁，阁圯后，易地保存，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庚子之乱（公元 1900 年）时遗失。

清初，都城隍庙因发生火灾，将庙会挪到往南之慈仁寺，每月三期，即月朔、月望、下浣三日，与明代都城隍庙庙会之日期相同。慈仁寺集市中最热闹的是书市，文人学子们到这里来寻觅他们所想要的书籍。王士禛曾说自己：“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当冬日过慈仁寺市，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孔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怡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居易

录》) 浸沉在慈仁寺里时间最久的人，要数王士禛（渔洋），那些渴望见到王士禛的人们只有到慈仁寺里书摊旁，才能见到他。如曲阜孔尚任的《燕台杂兴》诗中写道：“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样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王士禛自己也说：“昔有士欲谒余，不得见，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已而果然。”（《古夫于亭杂录》）那时慈仁寺备有清房，可供游人借宿。王士禛刚到北京做官时，经常在慈仁寺借宿，与骚人墨客在松前月下吟诵酬唱，可见当时文风之盛。

慈仁寺里的古玩市场也是有名的。那时已有以假充真、鱼目混珠的现象。一个名叫借山的和尚曾写诗说：“斗鸡酒缸久已无，何者柴官哥定汝？藕心钱破菱花暗，石黛朱砂剥欲腐。大概瓶炉冒宣德，商彝夏鼎谁能估。”又说：“倪黄王李迹模糊，米董苏黄款错迕。凡马皆称松雪翁，顽山尽识仇实父。”但也有能在书市画摊获得奇物的，如孙国敕在其《燕都游览志》中记了如下一则曾流传颇久的故事：“顺治己亥（公元 1659 年），京师慈仁寺市，有鬻故书者，鉴一敝刺，大书‘客氏拜’三字，宝应朱国桢克生以三钱得之，赋《客氏行》。友人笑曰：“使当天启时，此一纸，胜诏旨远矣。”

这说明在古玩摊也能买到真货，不过要费尽心机去交换。

慈仁寺里也有花市。孙岷瞻在其《竹枝词》中写道：“晴后春前春未回，燕京腊月少花开。明朝十五慈仁寺，